

SHIJI QIAOTOU NINGSI WENHUA ZOU SHI WENXUE QIANG

昌 切 / 著

世纪桥头凝思

——文化走势与文学趋向



湖 北 人 民 出 版 社



昌 切 / 著

世纪桥头凝思

——文化走势与文学趋向



北 人 民 出 版 社

鄂新登字 01 号

世纪桥头凝思

昌 切 著

——文化走势与文学趋向

出版：湖北人民出版社
发行：

地址：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 33 号
邮编：430022

印刷：武汉市汉桥印刷厂

经销：湖北省新华书店

开本：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张：9.75

字数：223 千字

插页：4

版次：2000 年 4 月第 1 版

印次：200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 720

定价：14.70 元

书号：ISBN 7-216-02855-4/G·717

目 录

导 论 文化走势与文学趋向	1
一、冷战终结	1
二、三分天下	4
三、两大热潮	9
四、二本分流	14
五、走向个人	19

第一章 文化检讨	23
第一节 清末民初文化嬗变的理路	24
一、时 限	24
二、历史逻辑序列	27
三、思维模式的转换	29
四、理论分析	31
第二节 中体西用：应时有效的策略	34
一、中体西用	35

世纪桥头凝思

二、理论预设的冲突	39
三、颠倒道器 重释体用	46
第三节 文化讨论的基点	51
一、献疑	51
二、两种思路	52
三、时空分裂	54
四、三个概念	57
五、基点移植	59
六、需求错置	61
七、如何传导	62
八、余论	65

第二章 三分格局与两极分化

第一节 文学的两极分化	67
一、引言	67
二、商业化、世俗化	69
三、神性化、圣洁化	80
四、为何两极分化	94
第二节 《废都》：文学裂变的标本	98
一、引言	98
二、感官文化	100
三、三种欲望	102
四、为何醉入感官文化	106
五、小结	111

目 录

第三节 现实主义冲击波	112
一、引 言	112
二、名称的由来	113
三、是回归、深化还是升温、消释	114
四、带引号的现实主义	119
五、现状和前景	122
六、小 结	127
第三章 唯圣的选择	129
第一节 唯圣派	130
一、命名的缘据	130
二、圣的含义	132
三、师心去隔	135
四、身隔心随	139
五、致独明心	143
六、清心退盟	148
七、诚心贯道	153
第二节 溃退中的抗争	156
一、文化溃退的艺术见证	157
二、美梦时代的终结	160
三、攀援极致	164
四、渴求全圆	168
第三节 文化散文	174
一、从两头走向中间	175

二、文化散文·····	180
三、新 体·····	185
第四章 在精神困境中突围·····	188
第一节 余华小说的核心语码·····	189
一、暴 力·····	190
二、现 实·····	193
三、事 件·····	198
四、历 史·····	199
五、时 间·····	200
第二节 刘继明小说的精神结构·····	203
一、根本属性·····	205
二、基本叙事结构·····	208
三、个体精神结构·····	211
四、群体精神结构·····	215
五、隐逸精神的复活·····	219
第三节 张执浩：游荡在两极之间的诗魂·····	224
一、互利的两级结构·····	225
二、敞开可能的世界·····	229
第五章 批评的现状与出路·····	238
第一节 泛道德主义与泛历史主义·····	239
一、泛道德主义·····	240
二、泛历史主义·····	251

目 录

第二节 文学论争的实质	255
一、缘 起	255
二、尺 度	258
三、感性层次	261
四、理性层次	264
第三节 走出 19 世纪 走进 20 世纪	267
一、引 言	267
二、人 文	268
三、走出 19 世纪	269
四、走进 20 世纪	277
第四节 趟出批评的新生之路	286
一、相对寂静	286
二、跨越后现代批评	287
三、跨越文化批评	291
四、大势所趋	295
五、趟出批评的新生之路	297
结语 离异与认同	301
后记	304
补记	306

导论 文化走势与文学趋向

我不知道怎样才能做出一篇像样的导论，只是觉得应该在这本书的前面说点什么。那么就从冷战终结说起吧。

一、冷战终结

冷战出现在“二战”结束以后。它以东西方为势不两立的两大阵营，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为不可调和的两种意识形态，并以这两种意识形态你死我活的冲突为中心，在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和军事上相互遏制和对抗，形成了长达数十年的全面对峙格局。这种对峙格局直到 80 年代后期、90 年代初苏联和东欧各国风云突变，接连爆发意识形态危机而引起社会震荡和制度更迭，华沙条约国组织自行解体，才正式宣告终结。

冷战终结以后，世界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东西方的意识形态冲突明显让位于国际性的经济实力竞争和文化较量，一体化或“全球化”与区域化或民族化的趋势并存，民族主义和宗教问题变得空前突出。

在冷战形成时期，世界的版图是依据意识形态而非民族和宗教来设计的。由于意识形态不同，同一民族国家可以被分割成不同的主权国家，如德国被分割为东德与西德，朝鲜被分割

世纪桥头凝思

为南朝鲜与北朝鲜，越南被分割为南越与北越；由于意识形态相同，不同民族国家可以被组合成同一主权国家，如苏联、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都是在兼并多个民族国家的基础上硬性组合的统一主权国家。而自 80 年代末以来，情形就截然不同了，国家的分化与组合完全是以民族共同体或宗教共同体为转移的，该合并的合并，如两德合并为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该分解的分解，如南斯拉夫、苏联和捷克斯洛伐克都重新分解为多个主权国家。

一体化与区域化是矛盾的，但这两种趋势的并存却是铁铸的事实。一体化的显著标志是政治—经济运作模式的趋同。俄国和东欧各国所进行的一系列政治—经济体制的改革，无不依循西方的基本理念，无不以西方的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体制为蓝本。有一体化就必然会有区域化。一体化是注定要带出一个族别辨识的问题来的。越是趋同，民族国家的族别意识以至区域意识就越是强烈。这里面有民族国家之间实力强弱的对比，有谁控制谁、谁支配谁的焦虑，有因民族身份的模糊而寻求自我认同的努力，有对国际交往中对等原则的殷切期待……一句话，一体化决不意味着族别和区域差异的消失，恰恰相反，一体化反而大大加强了各个民族国家的族别意识和区域意识。所谓“多元现代性”，所谓多极化，所谓欧盟，所谓亚太经济带，所谓“东亚模式”，所谓“中国特色”，所谓 21 世纪是中国的世纪的玄想和预言，等等，都是强化族别意识和区域意识的明证。

中国社会的结构性转换并非始于冷战终结以后，而是始于 80 年代中期，当时流行的一句老话叫“农村包围城市”，意思是说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心由农村转移到了城市。这次转移非同一般，改革面的扩大倒还在其次，把改革从经济的层面推进到

政治和文化的层面才是关键所在。中国社会随之开始快速分层，发生整体的结构性转换。不过，80年代后期的改革顾虑还太多，胆量还不够大，还缺乏应有的力度和跨度。放开手脚大搞市场经济是在冷战终结以后。国际形势的突变，市场经济在理论上彻底的合法化和权能化，市场经济取向的目标模式的确立，促使改革迈向了一个新的阶段。

改革的一大成果是催生了一个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享有相对独立权利、初步呈现活力的市民社会。任何权利都是有条件、有边界的，没有任何条件、任何边界的权利从来就是不存在的。中国的市民社会也不例外，也无缘获取和囊括绝对独立的特权。其特殊性仅仅在于，它是从“金字塔”式的社会结构中分化出来的，必须承受旧有体制的重压，接受新型社会结构的考验，在新旧两种体制的夹击中谋求生存和发展。也就是说，它还不可能“天马行空”，想怎么干就怎么干。但是，历史地看，这种市民社会毕竟是一个新的社会空间，有其新颖独立的一面，不缺少一般市民社会必备的属性。它的所有制不再是公有制，而是以财产私有为内核的多种所有制。市民不再是从属于“单位”的“政治动物”，不再可能被人贴上五花八门的政治标签，而是以“物性”或商品形式存在的一种“经济人”。它的人际关系不再是纯粹的政治—伦理关系，不必再服从基于集权的各种交往规则和伦理规范，而是以个体为基本单位、以契约为轴心形成的交换关系。它的价值衡量标准不再是无价的“忠诚”之类的政治—伦理标准，而是以赤裸裸的金钱为唯一价值尺度的经济标准。它的基本动力不再是战无不胜的“精神原子弹”，而是无处不在的追逐最大经济利益的强烈欲望。它的目的不再是为了实现某种“乌托邦”的梦想，而是为了最大限度的获利。

二、三分天下

冷战以后的文化犹如“乱花渐欲迷人眼”，其形态显得相当复杂。一方面是渴望“走向世界”、实现“现代化”，一方面是渴望复兴民族文化、实现“民族化”；一方面是文化启蒙思潮余波未平，“现代性冲动”持续不断，一方面是新保守主义思潮乘机泛起，批判“五四”激进主义，质疑启蒙理性，否定“现代性”；一方面是迎合“全球化”的大潮，谋求“国际对话”，一方面是重新抬出东方文明优越论的法宝，重弹“中体西用说”的老调；一方面是依靠从海外舶来的“后学”理论证实中国文化的特殊性，鼓吹“第三世界文化”，推行“母语写作”或“汉语写作”，一方面是仰仗老祖传的经典理论证实中国文化的普世性，试图“创造性地转化”传统文化……新旧搀和，中西杂糅，多极多向，清理起来十分困难，以致于有人用“灰暗”、用“无名”这样的字眼来形容、来说明这种混沌不明的状态。

有困难并不等于就不能清理，回避和搪塞都是不负责任的。完全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入手，采用多种办法进行清理。我的做法是，着眼于冷战以后的文化走势，关注新的文化现象，分析不同走向的文化，勾画文化的基本图景。

还是在好几年前我就意识到并提出，就“大趋势”而言，冷战终结以后的中国文化是国家意识形态文化、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的“三分天下”。这三种文化各据地势，各有自己的侧重点，各有自己的秉性、运作方式和适用区域。国家意识形态文化的侧重点是权力，它的最大要求是社会稳定；大众文化的侧重点是物质，它的最大要求是市场繁荣、财源茂盛；精英文化的侧重点是精神，它的最大要求是自我实现。道不同则难以

相谋，因而总是难免出现并存中的对立，互渗中的对抗。这种文化格局和在这种文化格局中出现的新情况在以前是不曾有过的。

不管前几年意识形态终结论在思想文化领域内是如何盛行，人们终将发现，在“三分天下”的文化格局中，国家意识形态文化仍然具有无可争议的权威性，居于主控地位，是主流文化。这种主流文化一如既往，生产机制和传播方式等都未发生任何本质的变化，仍然由强大的政治权力机构控制，能够卓有成效地自上而下地组织规模宏大的知识生产和知识教育。这是我们感同身受过的，印象很深。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则是新起的文化，带有一股新鲜气息，尤其值得探讨。

大众文化是工业时代市民社会的特产。它既不同于以往人所共知的大众文化即所谓工农兵文化，也不同于与官方文化（official culture）相对的民间文化（folk culture）和与高雅文化（high culture）相对的通俗文化（popular culture）。工农兵文化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一个特定的政治概念，与我所说的大众文化（mass culture）没有什么关系。民间文化属于农业时代，通俗文化古今通用，都与我所理解的大众文化不是一回事。我所理解的大众文化是从市民社会中孕育脱胎出来、在文化市场中成长壮大起来的一种市民文化。这种市民文化必须同时具备三项条件：大批量生产复制、大众传媒广泛传播、广大受众共同分享。这三项条件中的任何一项，在工业革命来临以前都是不可想象的，更不用说信息时代了。当然，大众文化与通俗文化在一般情况下是可以互换的，这是因为，工业时代的通俗文化通常都能同时满足大众文化的三项条件。

美国有些学者根据不同历史时期传媒在性质和功能上的区别，把西方文化的历程概括为精英文化（elite culture）、大众文

世纪桥头凝思

化和专门文化 (specialized culture) 三个阶段,称之为 EPS (the elitist - popular - specialized cycle)。在他们看来,通俗文化是 19 世纪工业革命的产物,而专门文化则诞生在工业时代向信息时代的转换过程之中。这里我不想涉及专门文化。西方的古代社会等级森严,僧侣、贵族阶层(精英)与农民、手工业者阶层尖锐对立,当时还没有产生有效的大众传媒将二者沟通,这就决定了在精英文化与民间文化之间存在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精英文化是垄断性的权威文化。工业革命瓦解了精英文化生存的基础,中产阶级的势力与日俱增,大众传媒应运而生,填平了隔在精英文化与民间文化之间的那道鸿沟,大众文化或通俗文化一跃而起,成为最为显赫的流行文化。^①

80 年代中期以来中国文化的转型,与西方文化的历程有着某种同源性,大体上相当于西方由精英文化向通俗文化的转化。不过,差异也是非常明显的,对此视而不见是不明智的。想想看,我们有没有僧侣阶层?有没有政教合一?有没有西方那样的贵族和僧侣精英?有没有西方那样的精英文化与民间文化的对立?毫无疑问,都没有。我们所有的只是统一意志、统一观念和统一趣味的意识形态文化。我们的文化转型实质上表现为意识形态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彼此消长。我们的大众文化也与西方的大众文化有所不同,明显负有“革命”的使命,带有发育不良的市民社会的“间性”特点,意识形态性与非意识形态性(民间性、娱乐性等等)淆然集于一身。我们的传媒不是

^① 请参阅威尔生 (Stan Le Roy Wilson):《大众传媒与大众文化概论》,第 1 编第 1 章,美国蓝登书屋,1989 年。需要指出,拙著所使用的精英文化这个概念,指的是与大众文化相对的精英文化,而不是威尔生所说的与民间文化相对的那种精英文化。

西方那样的大众传媒，全部由国家而不由市民社会控制，它的首要功能是体现国家的意志，传达国家的观念和趣味，满足大众的需要仅仅是它的“余事”、次要功能，它的大众性与孕育大众性的市民社会的独立性一样，只是相对的。

然而，具有“间性”和相对性的大众文化仍然是大众文化。大众文化所具有的种种特性，如商品性、娱乐性、保守性、成规性、非个人性、消费的即时性和一次性等等，它几乎全都拥有。大众文化的核心原则是经济功利（实利）主义，说句大白话，就是赚钱。不进入文化市场，不想方设法地取悦大众，不千方百计地达到盈利的目的，大众文化就不配称作大众文化。大众文化的趣味是一种能够为大多数人所欣赏的“平均趣味”。大众的层次比较多，趣味自然不尽一致，不取一种平均值就不能适应各个层次大众的需要。白领阶层的趣味划出了大众文化的平均线，市民社会风行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和审美取向，正是其他层次的大众所神往的。为什么在 90 年代的大众传媒上一片“星光灿烂”？不就是因为各路明星作为“大众情人”和“公众偶像”，成了文化市场上当之无愧的主角，轻而易举就能招来大群大群的追星族，为“造星族”带来大把大把的钞票？为什么《曼哈顿的中国女人》、《北京人在纽约》、《上海人在东京》、《凭海临风》、《日子》、《洋行里的中国女人》、《住别墅的女人》、《情满珠江》和《公关小姐》等作品走俏图书市场和红透荧屏？不就是因为这些小说、自叙传、他叙传和电视剧所描写、所刻画、所渲染的大多为大款新贵、白领佳丽奇特非凡而神秘的人生？他们出人头地后的豪华奢侈、气宇轩昂、珠光宝气，一句话，他们的“派”和“酷”，连同他们不得意时的窘迫、奋斗时的蹉跎，统统都成了他们自我炫耀和媚惑大众的资本。他们是 90 年代最大的宠儿，在很大程度

世纪桥头凝思

上支配了这个时代的文化趣味。

精英文化却没有这么幸运。与大众文化占尽春色、一路凯歌相反，精英文化在“三分天下”的文化格局中可以说是颇有点“风萧萧兮易水寒”的窘迫和悲壮，尽管这种窘迫和悲壮可能只是知识精英幻生的一种不实在、不实际的感觉。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一样，原也是从原有的文化板块中挤出来的，可一经落世便不得不面对一个远比它强大的文化新贵——大众文化的强力挤压，失去了当年在意识形态话语场上的那种豪情、那份辉煌。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是否拥有过真正的精英文化？很难说。谁都清楚，建国以后数十年间我们仅有过一种文化，那就是意识形态文化，大一统的，上上下下都能接受，人人习以为常，无所谓精英不精英。即使在 80 年代的前期，即使那时不乏批判意识极强的知识分子，从总体上看，也很难说存在什么知识精英及其文化。当时的知识精英还无法自立于世，还作不出其他的选择，而只能为在意识形态的话语场上争得一席之地而时“左”时右地来回折腾。“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不解决毛依附于皮的问题——不管这皮指的是什么——哪来的知识精英及其文化？这大概才是问题的实质所在。

直到搞了市场经济，有了市民社会，大众文化脱颖而出，从聚集在意识形态话语场的知识分子集群中挤出一个无复依傍的知识精英群落，这才有了名副其实的精英文化。按理想推想，精英文化的求真扬善逐美，是知识精英的魂之所系，是他们赖以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精英文化持守自由独立的人文主义立场，自觉地保持与另外两种话语之间的距离，不媚俗，也不媚势，对来自商潮和体制的诱惑始终保持高度的警惕。它以批判为自己的基本职能，不间断地“去蔽”，以维系世道人心

之不坠。它是任何一个正常社会都不可或缺的一种制衡力量。它的核心原则是精神功利（实利）主义，即守护和扩展人类恒定的精神价值。它不趋炎附势，永远与时髦无缘，因为它的趣味不是平均的，仅仅属于少数人，影响力和传播的范围都远远不及大众文化和主流文化。但它并不因此而消极无为，它的抵御功能十分强劲，影响力更为广泛持久。

三、两大热潮

90年代思想文化界的热门话题不少，如有关回归民间、回到个人的讨论，如有关“思想淡出，学术突出”以及“学术规范”的讨论，等等，都在一定的范围内造成了一定的声势。然而，真正参与人数较多，讨论范围较广，持续时间较长，形成热潮并影响至今的，可能只有关于人文精神和新保守主义的两次讨论。

也许连始作俑者也没有想到，人文精神的讨论后来会变得那么热闹。1993年上海的批评家率先在《上海文学》杂志挑起人文精神的话题，第二年这个话题就在北京和广州等大城市热了起来，甚至在海外华人那里都有了回应。不少耽于此道的人多是从“失落”这个角度来谈论人文精神的。这样谈未必有什么不好，但很容易钻进死胡同里出不来。人文精神果真失落了吗？不一定。倡导人文精神这件事本身就证明它没有失落。就是真的失落了，唤回来不就行了，实在犯不着大动干戈。之所以要大动干戈，肯定是有些人感到不如意，感到人文精神在现在遇到了麻烦。他们都打算唤回什么样的人文精神呢？依我看，至少有以儒学为主干的传统人文精神和“五四”启蒙主义的人文精神。这两种人文精神都是先有的，是从理论上作出的一种假定，与现在大众的文化需求有隔膜，不具有前瞻性。